第一章

山西抗日战争的准备

1937 年 7 月 7 日，从卢沟桥事变开始，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进行的一次最伟大的反侵略战争。

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妄图“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三个月灭亡全中国”，于是先抢占北平、天津，后分兵西进南下，侵略的战火向山西滚滚而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肩负着民族希望的八路军和山西各种抗日武装，利用山西得天独厚的战略地位和崇山峻岭、沟壑纵横的有利地形，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竖起了支持华北以至全国抗战的战略支点。

然而，山西的抗日斗争，并不始于卢沟桥事变。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的 1936 年，正如续范亭将军所描绘的那样，在山西就点燃了一支光明不大的“土蜡烛”。这支“土蜡烛”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爱国青年，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日洪流，吹响了山西抗日斗争的前奏曲，震撼了华北，震撼了全中国。

一、华北事变与党的政治策略的转变

山西抗战是华北抗战的一部分，又是华北抗战的中心。我们研究山西抗战，不能不从研究华北抗战开始。

1935 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华北事变，这是它侵略中国野心的又一次大暴露；而它侵略中国，只不过是妄图称霸世界的第一步。早在 19 世纪的后半叶，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把对外扩张的矛头首先指向中国。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所炮制的《田中奏议》，对于这一野心表白得最清楚不过了。他视满蒙的权力为“一大关键”，而满蒙就是中国的东北和内外蒙古：“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公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其匹敌。我国因欲开拓其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洲铁道会社，借日、支共存共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等业，达四亿四千余万元。此诚我国企业中最雄

大之组织也。’① 田中认为：“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中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② 可见日本的勃勃野心是称霸世界，而为了称霸世界，首先要灭亡中国。这个阴谋是由来已久的。

自此之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趋加紧。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仅仅 3 个月时间就把我国东北三省近 200 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和 3000 万同胞，置于其奴役和蹂躏之下。到 1935 年，又进而制造了令人心碎的华北事变。

其实，华北事变的发端，可以追溯到 1932 年。1932 年 3 月，日本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接着转锋南下，指向华北，于 1933 年占领了热河和察哈尔的北部。当时执掌全国政权的蒋介石在其政治、军事的天平上，把砝码重重地压在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的“围剿”上，竟向在冷口、喜峰口和古北口抵抗的守军下达“侈言抗日者杀勿赦’③的命令，致使日本侵略军得寸进尺，猖狂至极。1934 年，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又发表独占中国的“七·一

① 《田中奏议》，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92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②《田中奏议》，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侵华文件选辑》，94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③ 《从“九一八”到“七七”》，载《党史资料》1954（7），19 页。

四”声明。1935 年 5 月，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强迫南京政府指派察哈尔省代理省长秦德纯与其签订《秦土协定》。接着驻华北日军又以中国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为借口，向中国提出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六七月间，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进行谈判，结果秘密签订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实际上使中国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华北局势十分危急。

《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签订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放肆起来了。他们收买汉奸，策动所谓华北 5 省“防共自治运动”，妄图使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等 5 省脱离中国而“独立”。10 月，日本在冀东数县策划“香河暴动”，侵占了香河城，成立了“县政临时维持会”。11 月，进而唆使原国民党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开始叫“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仅如此，日本还在长城各口大量增兵，并以“演习”为名，在北平、天津街头耀武扬威，支持汉奸卖国贼的分裂活动。

在加紧政治、军事侵略的同时，日本还以“中日经济提携”为幌子，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掠夺。

这一切，使整个华北的局势越来越恶化。

中日矛盾的突出，必然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适应这种变化，中国共产党必须改变自己的政治策略。在日

本入侵之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主要是通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封建买办性的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表现出来的。所以，这些矛盾归结起来，还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同中国人民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工人、农民等革命群众，与新型的带买办性的封建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集团之间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① 因之，中国共产党采取武装对抗的手段，目的是用革命战争推翻封建的、买办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条件。

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的矛盾，一跃而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了每个中国人的面前。不仅工人、农民面临着灭顶的惨祸，而且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就是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买办资产阶级，也与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矛盾。“这种形势，就给中国一切

① 《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第 3 卷，103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①]所以，抗日救亡便成了除投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卖国贼以外的每一个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不但工人、农民和广大青年学生都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卷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就是处于社会上层的各阶级、阶层及无党派人士，也在发生变化，其中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感者，加入了抗日反蒋斗争。他们一方面反对蒋介石集团“攘外必先安内”和“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政策，另一方面奋起支持和声援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早在 1932 年 3 月，沪粤一部分国民党人，就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深表不满。驻沪一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曾致电蒋、汪云：“日人陆续增援，至穷师数万……我方……合计不过三四万人，每战对敌，义薄云霄，唯以众寡悬殊，益以疲劳，上海之危，早在意料。……迭电请援……声嘶力竭，以致为敌所乘……观十九路军通电，有‘后援不继’之语，孰令致之，当局不能不负其责也。”[②] 4 月，国民党政府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议决“对日交涉”、“全力剿共”的方针。会议闭幕时，《申报》、《大公报》就发表著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于共产，势在必剿”的国策。10 月，冯玉祥等 15

①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14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 《从“九一八”到“七七”》，载《党史资料》，1954（7），14 页。

人通电全国，指责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之谬误，要求“当局……于政策有坚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之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抗暴日而复失地”①。1933 年 4 月，马相伯等发表宣言，指斥国民党“阳示抵抗以息人言，阴作妥协以受敌饵，则吾人直无异于……默认日本之行动，是即自甘宰割，自甘灭亡”②。6 月，上海日文《每日新闻》载一长文，揭露中国法西斯恐怖的惨状，谓：“法西斯暴力团的横行……袭击共产党，逮捕左翼作家……这种暴力团的尖刀不仅向着共产党员，而且向着反蒋派的政客……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派往以上海为中心的沪宁、沪杭甬沿线去的侦察队、铁血团、团警班（法西斯的政治警察）总计十组，团员达二百余人……法西斯暴力团的凶焰上升，演出许多流血的惨案，使得中国人方面，抱着极端恐怖情绪。”③ 1934 年 4 月，宋庆龄、马相伯、何香凝、李杜等公布《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号召“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出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④。各地人民纷起响应。1936 年 7 月，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表现在军事

① 《从“九一八”到“七七”》，载《党史资料》1954（7），16 页。
② 《从“九一八”到“七七”》，载《党史资料》 1954（7），20 页。
③ 《从“九一八”到“七七”》，载《党史资料》 1954（7），21 页。
④ 《从“九一八”到“七七”》，载《党史资料》 1954（7），25 页。

斗争上。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 11 月日军进攻嫩江桥，马占山率部抗击，击溃日军多门师团。 1932 年 1 月，日军进攻上海时，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表示：“ 日军倘敢进犯，决予抗击 ”。1 月 28 日日军进攻时，第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下的“ 撤退 ”的命令，奋起抗战。同时，各省将士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缨抗日，自愿牺牲。 1933 年 5 月，以冯玉祥为首的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同共产党人合作，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宣布对日作战。在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人的领导下，抗日同盟军于 6 月 20 日开始北征，到 7 月 12 日把日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1933 年 11 月，被蒋介石调至福建“ 围剿 ”红军的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率领下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表示愿意与红军合作，并与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1936 年 11 月，日军侵犯绥远时，傅作义率部抗战，取得了收复百灵庙的胜利。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全国各阶层抗日怒潮的震慑，九一八事变时抱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虽然仍不放弃其“ 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但也开始谈论抗日问题了。

随着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需要改变自己的政治策略，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进行伟大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 左 ”倾教条主义者，却

采取了一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关门主义的错误政策。对于这种“左”倾教条主义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表现，毛泽东作了这样尖锐而深刻的抨击：“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①]其实，“左”倾教条主义采取的恰恰是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的策略、机会主义的策略。

为了克服“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担负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历史使命，彻底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中国共产党于 1935 年 12 月 25 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 12 月 27 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决议和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策略，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和具体规定，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

①《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见《毛泽东选集》第 1卷，154～15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的根本性的转变。

瓦窑堡会议制定的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是建立在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的科学分析之上的。会议指出，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控制华北之后，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①，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各个阶级、阶层、政党以及各种武装力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工人和农民这两支革命的基本力量，“积极参加革命斗争”②；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又“转入了革命”③，他们掀起了“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④；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也“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⑤。总之，一切爱国的中国人，都走上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革命的道路。据此，瓦

①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②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③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④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⑤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窑堡会议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指出党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集中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① 对于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各种社会成分，瓦窑堡会议分析了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分别制定了具体的政策。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②。对于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军阀，当其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时，则“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③。对于封建地主和买办阶级营垒中的矛盾与冲突，也应加以

①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50～5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②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5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③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51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利用，“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策略，也应当是利用矛盾，使之有利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为了适应这种政治策略的转变，瓦窑堡会议还决定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原来的“工农共和国”的口号。人民共和国仍然以工农为主体，团结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同时也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个人、团体、政治派别和武装力量。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工农的，也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在政策上，把工农民主共和国的许多政策，改变得适应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要求。如对待富农的政策，由“加紧反富农”改变为“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① 的政策。对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决议也采取了比过去更为宽松的政策，规定“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②，等等。

按照瓦窑堡会议的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不但要在工人、农民中进行活动，而且还必须深入到一切群众的、民族的阶级斗争中去；不但要在下层群众中进行工作，而且必须懂得如何在上层人物中进行工作，以

① ②《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2），5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

争取和团结一切能够合作的人；不但要团结一直在党的领导下的阶级和阶层，而且要争取过去曾经与党对立而现在可以争取的、在投降日本问题上动摇的阶级和阶层。当然，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取消斗争，并不能背弃抗日爱国这个原则。

在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曾一再提出，在抗日爱国的基础上，愿意与一切党派、团体、军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响亮的口号，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1933 年 1 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发表宣言，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① 1934 年 4 月，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建立反帝统一战线。1935 年的《八一宣言》，又重申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但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由于蒋介石一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方针，使内战一直不停。蒋介石连续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的五次反革命“围剿”，

①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54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致使中国共产党联合各阶层一切爱国人士共同抗日的主张一直不能实现。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会议的决议，先后采取了四项积极的措施，大大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进程。第一，大力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加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舆论准备，动员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在一条战线上，以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第二，积极开展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公开发表宣言，向广大将士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重要性，只有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同时明确表示红军愿意首先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这是做基层群众的工作。另一方面，大力做上层人物的争取工作。毛泽东、彭德怀曾多次给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写信，分别向他们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兼主任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专做东北军的工作。 1936 年春，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先后与西北军和东北军达成了包括互不侵犯、互派代表、互相帮助、共同准备抗日等内容的重要协定，使红军与东北军和西北军从 1936 年上半年起，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走向联合。第三，与南京国民党最高当局接触，争取其走上抗日的道路。为了推动南京国民党最高当局抗日，从 1935 年 11 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应国民党英美派的要求，曾先后通过中共中央长江局、北方局同他们洽谈。 1936 年 1 月，中共代表周小舟

和吕振羽，携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信到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湛小岑进行谈判。同时，周小舟还带有信件给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等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5月 5 日，毛泽东、朱德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12月 1 日，毛泽东、朱德等 19 位红军将领致函蒋介石，提出化敌为友、共同抗日的主张。这些措施虽然由于蒋介石毫无诚意未能达成协议，但中国共产党却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第四，动员和支持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活动。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如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工人救国会，等等。 1936 年 5 月，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毛泽东写信表示热情的赞扬和支持。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主张，深得全国各个阶级、阶层、政党和军队中爱国人士的拥护和欢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举国一致集中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及一切有爱国心、民族感的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就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红军东征的作用和影响

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在确定新的政治策略的同时，还就军事战略问题作出了决议，并且决定红军渡河东征，向山西打开抗日通路。

山西是阎锡山统治的地区。阎锡山是一个占地为王的封建买办性军阀，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之一。他实施了一整套统治制度和办法，使山西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使山西的革命志士处于白色恐怖的摧残之下。但是，红军突破黄河天险，东征入晋，打破了阎锡山苦心经营的独立王国，抗日的东风吹进了吕梁山区和汾河流域，把山西引入了一个新天地。

中共中央在《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确定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①。为坚决地执行这一战略方针，要求"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地联起来。"同时决定具体步骤是："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

①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见《六大以来》（下），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东边的山西，北边的绥远等省去。”①

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渡河东征，经过山西，开赴河北、绥远前线，彻底粉碎国民党对陕北苏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大量消灭阻拦红军抗日的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壮大和发展红军的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同时，以实际行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并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据此，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红一方面军和原在陕北的红军共 2 万余人，分别编为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在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等的率领下，渡河东征。同时，决定周恩来负责后方工作。

东征的前沿阵地是山西。而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势不两立的。红军在遵义会议后向陕甘边界进发时，阎锡山就十分恐慌。他对原在陕北的红军防范就很严，曾说：“晋陕毗连，陕北红军之活跃，实威胁山西之安全。”又说：“共产党采取一种‘内溃’政策，不断地暗中派人过河，从事宣传工作，引诱老百姓。我们将有陷于内外夹攻形势的危险，还不如趁早下手，帮助陕北

①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见《六大以来》（下），28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